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魏
晋
南
北
朝

巴蜀书社

译注 韩结根

审阅 章培恒

洛阳伽蓝记选译



洛阳伽蓝记选



(川)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林 建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洛阳伽蓝记选译

韩结根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17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序

625/10/49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马樟根、安平秋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言

《洛阳伽蓝记》，向来与《水经注》一道被人们誉为中国北朝散文著作的双璧。《水经注》是一部以记载水道为主的地理性质的著作，而《洛阳伽蓝记》则是以记佛寺为纲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所以，在介绍这部书之前，有必要简单谈谈当时佛教发展与佛寺修建的有关情况。

印度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汉明帝在洛阳建立白马寺，经过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繁衍和佛寺的众多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唐代著名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名句，为我们约略勾画出当时南朝佛寺的兴旺景象，而当时北朝佛寺之多则更为惊人。北魏信佛以建功德求福为主要特征，早在五世纪初北魏建

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时，便已在云冈大量修建庙宇，雕塑佛像。太和十八年（494年），魏孝文帝为了摆脱鲜卑贵族保守思想的影响，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统治，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并以此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佛教寺院更是大规模兴建起来。据史书载，到公元536年东魏分裂、孝静帝迁都邺城之前，全国僧尼已达二百万，佛寺三万余所，仅洛阳城内外就有佛寺一千三百七十六所，“寺夺民居，三分且一”。

北魏统治者兴建那么多寺院，大多尽一切财力物力而为之。一方面，它们是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庄严富丽的建筑物与风景优美的园林；另一方面，它们的建成又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反映，是北魏中后期社会生活的侧影。正如恩格斯所说：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北魏中后期佛教的兴盛，寺院的大量兴建，是跟孝文帝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爆发了尖锐矛盾，从建义元年（528年）起连续发生大规模战乱以后，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佛寺也就萧条了。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杨衒之（有的书中

“杨”误作“羊”，也有写作“阳”的，都不可作为依据），《魏书》、《北史》均不立传，生平事迹不甚可考，有的说他曾任北齐时期城郡太守，也有的说他官至秘书监，都不知道确否。不过从本书卷首署名及卷中自述来看，作者曾任北魏抚军司马，担任过奉朝请，并且亲身经历北魏中后期的全盛与变乱。东魏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杨衒之因有事重经洛阳，看到“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洛阳伽蓝记》原序），昔日金碧辉煌鳞次栉比的寺院宫观都成了鸟兽出没之所与牧童野老往返之地，于是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之余，写下了《洛阳伽蓝记》一书。伽蓝*，梵文Samgharama（僧伽蓝摩）音译的略称，意思是“众园”或“僧院”，即佛教僧院。他之所以写这部书，不单是为了记录北魏佛教全盛时期的概貌，也是为了纪叙当时社会的富庶，追溯祸乱的由来，悲慨繁华的消失。因此，这绝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北魏佛寺的书，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有价值。

当然，正如其书所显示的，作者的记述是以洛阳的寺院为纲。全书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卷。作者先从城内开始，由里及外，并且表列门名，兼记远近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

与名胜古迹。全书记载了洛阳大大小小八十多所寺院（按，此指洛阳城内外寺院，《闻义里》篇中所记西域寺院不包括在内）。记寺院先记立寺人、立寺时间、寺院方位，再记建筑结构、周围环境并其兴废沿革。市里、官署、道路、桥梁、时人第宅及名胜古迹等也多交待其地理位置。这些记载都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根据它我们完全可以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时期京城洛阳地理图。而且，作者特别对那些较大的寺院建筑作了详细的描绘渲染。这些描写既有微观的，也有宏观的；有立体的，也有平面的；有单个的建筑，也有综合的建筑群。它不仅使我们领略到了一千多年前那宏丽优美的宗教建筑艺术，更使我们通过它想见到北魏盛时佛教的繁荣兴旺景象。书中对《永宁寺》宝塔的描写，对《瑶光寺》中西游园的描写，对冲觉寺寺塔佛殿的描写，以及景林寺、河间寺园林的描写等就是很好例证。至于书中所写景明寺四月八日的法会，更把人们带入一个动态的宗教氛围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僧侣到庶民百姓，其信佛达到何等狂热的地步！

《洛阳伽蓝记》在记录北魏寺院的盛况时，还叙述了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永宁寺》中就曾提到后来被尊为中国禅宗始祖的波斯国菩提达摩曾经

到过洛阳，法云寺专门记载了乌场国沙门昙摩罗在洛阳收徒授法之事，而《永明寺》篇则集中反映了当时外国僧人来华盛况，当时住在永明寺里的异国沙门有三千多人，他们当中最远的西至古罗马帝国，南至今天的马来半岛，甚至一些“世不与中国交通”的国家僧人也来了。北魏佛教的发展，不仅吸引佛徒东来，也引起了僧侣西行求法的要求。卷五《闻义里》就是一篇专门记载沙门惠生与敦煌人宋云往西域求取佛经的文字。宋云与惠生往西域求法在晋法显后而在唐玄奘以前，沿途经历凡二十七国，历时两年多，是中国佛教史（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伽蓝记》中的记载为我们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文献。

这些有关佛教文化交流的记载中还记录了交往各国的社会政治、风土人情、物产出品等。如《永明寺》中就提到大秦国“耕耘绩纺，百姓野居，邑屋相望，衣服车马，拟仪中国”，扶南国“出明珠金玉及水精珍异，饶槟榔”。《闻义里》则记于阗国“其俗妇人裤衫束带，乘马驰走，与丈夫无异。死者以火焚烧，收骨葬之”；乌场国中“假有死罪，不立杀刑，唯徙空山，任其饮啄。事涉疑似，以药服之，清浊则验”等等。这些记载都反映了当时人对那些国家的了解，实际上也正显示了对外文

化交流的水平。

可以说，佛教文化的交流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整个对外交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在《龙华寺》篇关于“四夷馆”与“四夷里”的记载中告诉我们，当时那里住着一万多户外来人口，除了江南人外，西域外商长住洛阳的也不少，所谓“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服，商胡客贩，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这虽然有些过甚其词，但确可窥见对外贸易发达之一斑。没有这样兴盛的对外贸易，也就不可能有高度的文化交流。

当然繁盛的对外贸易又必然以本国的经济繁荣为基础。北魏中期，经过孝文帝改革后，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朝廷放松了对伎作户的控制后，民间的手工业与商业日益活跃起来。《洛阳伽蓝记》描绘佛寺的盛况，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材料。如作者在《法云寺》篇记载洛阳大市东西南北四市时写道：“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以酝酒为业。”“市北有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輶车为事。”“别有阜财、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作者描绘他们的居

住与生活情况是：“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缁衣；五味八珍，仆夫毕口。”手工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富裕，也使交换关系活跃起来。如书中写到富商刘宝，他在州郡都会之处都立宅养马以通行情，以致各地所卖盐粟货物价格他都能掌握。

工商业的发达必然导致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彩，《洛阳伽蓝记》所记载的当时民间杂技百戏之盛，也正是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一个侧面。《景乐寺》载，四月四日出像时，“辟邪师子导引其前”，艺人们“吞刀吐火，腾骧一面，缘幢上索，诡譎不常。奇伎异服，冠于都市”。《长秋寺》载：“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扑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剥驴投井，植枣种瓜，须臾之间，皆得食之。士女观者，目乱睛迷。”至于秦汉的角抵戏，到北魏也继续有所发展，《禅虚寺》：“有羽林与僧善相角觝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从这些记载看，当时表演的节目形形色色，场面相当阔大，情节精彩纷呈，观众上自帝王，下至普通青年男女，它充分体现北朝民间伎艺配合城市经济繁荣所获致的高度发展，是我们研究早期杂技史、戏剧史以及城市

生活的重要资料。

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生活的富裕都离不开人材。《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线索，还描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其中有不少是作者所赞赏的人物。如有“学极六经，说通百氏”的卢白头，有“清尚卓逸”、口若悬河的杨元慎，有被誉为“文宗学府，腾班马而孤上；英规胜范，凌许郭而独高”的邢子才，有先在南朝为官，后投奔北魏，因博通旧事而深得孝文帝赏识的王肃，还有风度翩翩、辨慧清悟的元氏诸王元彧、元略等等。作者不仅交待他们的生平、爵里，有的还花费大量笔墨记其佚事。虽然作者意在反映北魏人才之盛，然我们也可从中窥见当时北方士人与贵族的风貌。特别是有些人史书未载，更可补史书之不足。

《洛阳伽蓝记》的作者是站在眼前的废墟上憧憬着昔日繁华的影子，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者，他当然没有忘记写故国由盛转衰乃至灭亡的原因及其过程。北魏后期世宗元恪死时，肃宗年幼，母亲胡太后临朝称制。后肃宗渐长，母子争权，屡生嫌隙。肃宗十九岁暴亡，胡太后为继续掌权，立临洮王三岁之子元钊为帝。因此时论以为，肃宗之死系胡太后贪秉朝政所致。于是北秀容胡契部落酋长尔朱荣趁机起兵，终至引发大规模长时期的内乱，北

魏衰亡。胡太后专政所引发的尔朱荣之乱是北魏由盛转衰的关键性事件，所以作者再三致意，他不仅以永宁寺为横线系统地记叙了这一变乱的具体情况，而且在记载其他佛寺时也多次提到这次变乱及其影响，并且对发动变乱的罪魁祸首尔朱荣及其一伙进行了抨击，同时也对胡太后有所讽刺。

北魏衰亡虽主要是由于尔朱荣之乱，而诸王腐化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北魏统治者是无比荒淫的游牧贵族，孝文帝改革以后，社会经济有了发展，获得财富更加容易，这就更助长了他们养成奢侈的习惯。《伽蓝记》中所反映的元氏诸王奢侈腐化的生活面貌是空前的。如《高阳王寺》中写到高阳王元雍“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于帝宫”。又说他“厚自奉养，一食必以万钱为限，海陆珍馐，方丈于前”。如果说元雍的豪奢还只能代表个别情况的话，那么作者在《寿丘里》中则借这一皇宗聚居地的典型环境，为我们揭示出当时整个帝室王族穷奢极欲的生活面貌：“于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其中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他经常与高阳王争衡。元琛建造的文柏堂，形状如同皇宫中的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绩为绳”，又遣使至西域购求名马，“以银为槽，金为锁环”。正是由于

统治阶级这种无止境的挥霍，直接破坏了社会经济，使社会矛盾更为激化，所以才有《伽蓝记》中所提及的万俟丑奴、葛荣等人的起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奢侈腐化，酿成日后王室削弱，以致尔朱荣起兵时无力制止，只能束手待毙。“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北魏末年的变乱，元氏诸王是不能辞其咎的。

此外，书中还有关于对封建社会史书与墓志虚伪性的讽刺，有对于某些地方风俗变迁的揶揄等等。总之，《洛阳伽蓝记》内容丰富，它以写北魏洛阳佛教寺院的兴废沿革为纲，同时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有关事实，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

然而，《洛阳伽蓝记》之所以能在一千多年来一直吸引读者，长盛不衰，还不仅仅由于它的内容，同时也有赖于它的描写技术。在这方面，首先要注意的是它的精彩的语言艺术。前面提到作者为我们状写了那么多的寺塔园林，有的壮丽辉煌，有的清新动人，有的形象飞动，使人如履其境，这就靠的是语言艺术。《伽蓝记》精彩的句子俯拾即是，这里我们不妨再举两例，如《闻义里》中写惠